崔溥《漂海录》与鲁认《锦溪日记》里的历史文化认识

朴永焕[1]

提　要：崔溥与鲁认，皆为全罗道罗州人。他们分别于弘治元年（1488）和万历二十七年（1599）因故前往中国南部，并各自留下了《漂海录》与《锦溪日记》，记录了他们在中国南方的见闻。从这些珍贵的记录中，可以了解当时明朝文人的历史认识、宗教思想、风俗习惯。还可以透过二人观察中国的视角，反观十五、十六世纪朝鲜士人的历史认识、学术、宗教观，也能够认识到这百年之间韩半岛士人历史认识变化和迁移过程。崔溥在记录中一再强调“一遵华制”、“一从《朱文公家礼》”，在鲁认《锦溪日记》中，亦常常可见“小中华”之叙述，此外，鲁认所强调的“小中华意识”，核心在“朝鲜与诸夏无异”，强调了朝鲜与明朝文明的同等性。二人的记载中，都出现了不少关于宗教和信仰的记述，他们对于明朝佛道信仰的盛行都十分不满，从中可以窥见将儒学（性理学）作为最高统治理念的朝鲜王朝，建国之后一直推动排佛、抑佛政策。这种崇儒排佛的基调愈演愈烈，到了朝鲜中期以后，程朱理学思想与理念基本上代替了所有宗教理念。呈现出与当时中国完全不同的景象。

关键词：崔溥；鲁认；漂海录；锦溪日记；历史认识；宗教观

The historical cognition in the "Pyohaerok" and "Geumgye Diary"

Piao Yonghuan

Abstract: Choe Bu and No'In all of them are Jeolla people of Joseon Dynasty, and they went to southern China in 1488 and 1599,respectively. They also left the "Pyohaerok" and "Geumgye Diary", which recorded their knowledge in southern China. From these precious records, we can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religious thoughts, customs and habits of the Ming Dynasty literati. It is also possible to investigate the historical cognition, academic and religious views of the Korean scholars in the 15th and 16th centuries, and to recognize the chang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Koreans in the 100 years through the perspective of them observe the China . In the record, Choe Bu repeatedly emphasized "accordance with the etiquette system of the Ming Dynasty" and "accordance with the ‘Zhu Wengong's family ceremony’". In No'In's Geumgye Diary, the narrative of “small Sinocentrism” is often seen. In addition, No'In's view on “small China consciousness” is centered on “Korea and China are no different”,

emphasizing equality of Korea and China civilization. In the records of the two, there have been many accounts of religions and beliefs, and they are very dissatisfied with the prevalence of Buddhism in the Ming Dynasty. From this, we can see that the Joseon Dynasty that used Confucianism as the highest ruling concept and it has always promoted the policy of arranging Buddha and suppressing Buddha from found of country, and the Confucianism has replaced all religious ideas in the middle of the Joseon Dynasty .

Key Word: Choe Bu; No'In; Pyohaerok; Geumgye Diary; historical cognition; religious views

崔溥与鲁认，皆为全罗道罗州人。崔溥（1454–1504）字渊渊，号锦南。朝鲜端宗二年（1454）出生于全罗道罗州曲江面。鲁认（1566–1622），字公识，号锦溪。朝鲜明宗二十一年（1566）出生于全罗道罗州荷衣里。他们都是代表朝鲜性理学者的门下：崔溥师事于金宗直，成宗八年（明成化十三年），24岁中进士。鲁认师事于李珥门下（南塘金光运），宣祖十五年（明万历十年），17岁中进士。他们漂流过程中都为亲丧中（鲁认认为他的父母都去世）。他们各留下了日记体记录《漂海录》与《锦溪日记》，都记录中国南方的历史文化。 在韩中文化交流都以北方为中心的情况下，这些中国南方的记录显得非常珍贵。《漂海录》详细记录明朝弘治元年（1488）1月–6月海防、政制以及江南运河交通、城市文化、地理民俗、市井风情等方面的情况，堪称十五世纪末韩中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枝奇葩。《锦溪日记》记载了万历二十七年（1599）2–6月间鲁认在闽地的见闻，为向朝鲜最早介绍闽地的记录。据此，我们得以直接回到明朝末年闽文化的环境之中，具体了解十六世纪末闽地的政治社会情况，以及明代士大夫的观念与思想等。《漂海录》、《锦溪日记》堪称十六世纪末韩中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枝奇篇，其各个独具特色的文化信息，值得进一步分析和比较。由此不仅可以了解十五、十六世纪朝鲜士人的历史认识、学术、宗教观，也能够认识到这百年之间韩半岛士人历史认识变化和迁移过程，同时亦可认识当时明朝文人的历史认识、宗教思想、风俗习惯。故笔者将从上古史、中古史、宗教思想等三个角度分析《漂海录》与《锦溪日记》的记录。

一、对古代史的认识

在司马迁的《史记》中记载[2]，商朝最后一个国王纣王的王叔箕子在周武王伐纣后，带着商朝的礼仪和制度到了韩半岛北部建立了箕氏侯国，被周朝封朝鲜侯并得到周朝的承认而成为诸侯。这就是所谓的“箕子朝鲜”的主张。

如今，在韩国史学界，一般来说，不少学者倾向于否定“箕子朝鲜”的历史。“箕子朝鲜”的主张被看作是以一部分中国史学界中华意识的表现。但在十五到十六世纪，朝鲜士大夫或明朝都对箕子朝鲜的存在，或称“箕子东来说”，具有普遍性的认识，坚信不疑。这种“箕子朝鲜”的主张一般都作为华夷的世界观及慕华思想的重要根据產生了重要影响。在此，首先了解一下崔溥《漂海录》里面的檀君与箕子朝鲜观。

（一）崔溥对上古史的认识

崔溥一行被认为倭寇，2月4日到绍兴府被审问时，官府让他记录朝鲜的历代沿革以及制度。当时崔溥说：

沿革都邑，则初檀君，与唐尧并立，国号朝鲜，都平壤。历世千有余年，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鲜，都平壤，以八条教民，今国人以礼义成俗始此。厥后燕人卫满，亡命入朝鲜，逐箕子之后箕准，准奔马韩以都焉。其间或为九韩，或为二府，或为四郡，或为三韩，年代久远，不能尽述。[3]

崔溥在此，说明了两点：其一，朝鲜历史的沿革从檀君开始，檀君与尧舜并立，强调了朝鲜与中国同样有着类似的悠久历史。其次，说明周武王特封箕子[4]，以八条教民，所以朝鲜礼乐制度从此开始的。在此，说明箕子为朝鲜的教化之主，亦是慕华的象征人物。崔溥根据“箕子东来说”说明了朝鲜文明之始源，同时强调了朝鲜和中国文明的同源性，又说明了卫满朝鲜的存在。2月17日，到了苏州姑苏驿，崔溥见到王、宋按察御史，他们问崔溥箕子朝鲜之事：

又问曰：“箕子封朝鲜，今有后否，且有廟墓祀事不废否。”臣对曰：“箕子之后，箕准为卫满所逐，奔马韩以立都，后为百济所灭，今無嗣。箕子廟在平壤，国家每岁春秋，降香祝牲币以致祭。”[5]

针对箕子庙祭祀的问题，一年春秋两次，祭祀于平壤的箕子庙[6]。这些观点似乎是朝鲜时代士大夫普遍的历史观[7]。这些认识延续到大约百年后，鲁认亦在《锦溪日记》说明了类似的主张。至于箕子后裔箕准被卫满朝鲜所驱逐，到韩半岛西南部建立马韩，但是后来被百济所灭亡。在此，认为马韩是继承箕子朝鲜的正统，这些认识似乎与朱子主张三国时代蜀汉继承汉朝的观点类似[8]。

至于礼仪制度和冠婚丧制，崔溥详细说明朝鲜各遵儒术和《朱子家礼》。如说：

俗尚则尚礼义，明五伦，重儒术。每春秋，行养老宴，鄉射礼，鄉飲酒礼。祀典则社稷、宗庙、释奠、诸山川，刑制从《大明律》，丧制从《朱子家礼》，冠裳遵华制，户口兵制田赋，我以儒臣，未知其详。[9]

“尚礼义”、“重儒术”，刑法制度根据《大明律》[10]，冠婚丧制根据《朱子家礼》，“冠裳遵华制”等，说明了朝鲜与明朝的统一性。

闰1月19日，崔溥一行到了海門衛的桃渚所。虽然崔溥几次解释自己是朝鲜人，但是明朝官吏们还疑心崔溥一行为倭人。当时有个卢夫容向崔溥问朝鲜之制度：

谓臣曰：“车同轨，书同文，独你语音，不同中国，何也？”臣答曰：“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足下怪听我言，我亦怪听足下之言，习俗然也。然同得天所赋之性，则我之性，亦尧舜孔颜之性，岂嫌于语音之有异哉！”其人抚掌曰：“你奔丧，可行朱文公家礼乎？”臣答曰：“我国人守丧，皆一遵家礼，我当从之。但为风所逆，迨今不得哭于柩前，所以痛哭。”[11]

在此，说明三个问题：其一，针对为何朝鲜与中国语言不通的问题，回答是由于“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语言当然不同。其二，无论朝鲜或明朝人，都得到天赋予的共同人性，即朝鲜与明朝人，都依据于尧、舜、孔（孔子）、颜（颜子）之性。既然本性相同，当然不需嫌忌语音的差异。其三，朝鲜丧制完全遵照《朱子家礼》。就是说明了朝鲜

与明朝文化、学术的同源，亦是强调了本性的一致。在此，充分体现出崔溥“小中华”的意识和内涵。

在于1曰21日，把总官让崔溥记录有关朝鲜“所读诗书，尊崇何典，衣冠礼乐。”制度方面内容：崔溥说：“本国地方，则无虑数千余里，有八道，所属州府郡县，总三百有余。所产则人材、五谷、马、牛、鸡、犬。所读而尊崇者，四书五经，衣冠礼乐，则一遵华制。”[12]

2月7日在杭州，晚上按察提调学校副使郑大人与另外一大人一起到于驿站，提问朝鲜科举制度后，又问了朝鲜文章的体裁，当时崔溥说：“又问曰：‘文章体格如何？’臣曰：‘表倣宋、元播芳，记论倣唐、宋。义拈出五经文，疑拈出四书文为题，并遵华格，对策倣文选对策。’”[13]

在此，崔溥根本不提“小中华”三个字，然而他的“衣冠礼乐。则一遵华制”、“疑拈出四书文为题。并遵华格”等论述里面，略见于小中华的端绪。

2月18日，他们从苏州出发，向锡山驿之时，姓罗的太监以及三名御史饯行崔溥一行。崔溥与他们之间谈论朝鲜与明朝制度上的异同。在此崔溥表现出小中华意识：

又问曰：“你国丧礼行几年？”臣曰：“一从朱文公家礼。斩衰，齐衰皆三年。大功以下。皆有等杀。”又曰：“你国礼有几条？刑有几条？”臣曰：“礼有吉，凶，军，宾，嘉。刑有斩，绞，流，徒，杖，笞。一从大明律制。”又曰：“你国用何正朔？用何年号？”臣曰：“一遵大明正朔年号。”又曰：“今年是何年号？”臣曰：“弘治元年。”又曰：“日月不久，何以知之？”臣曰：“大明初出海上，万邦所照，况我国与大国为一家，贡献不絶，何以不知。”又曰：“你国冠服，与中国同否？”臣曰：“凡朝服，公服，深衣，圆领。一遵华服。”[14]

自“一从《朱文公家礼》”、“一从《大明律》制”、“一遵大明正朔年号”、“一遵华服”，加强说明朝鲜与明朝在冠婚丧制、法制、年号、服饰上的一致。尤其是在此使用“一”字，意思是完全的、全面的、一致的，强调了似乎没有不同的。在此基础上，崔溥定为“我国与大国为一家”，因为“大明初出海上，万邦所照”，天上只有一个太阳。虽然在文章中根本找不到“小中华”三个字，很明显，他不仅反映出慕华思想，亦完全表现出小中华的意识。亦表现于“我国与大国为一家”八个字里面。有趣的是，过了约一百年之后，在鲁认《锦溪日记》里面，经常出现“小中华”三个字。可以了解十六世纪朝鲜普遍存在“小中华”意识。

（二）鲁认对上古史的认识

到了十六世纪，性理学（朱子学）在朝鲜深深扎下了根，加上士林派掌握政权后，开始出现推崇慕华思想和箕子的思潮；尤其是壬辰倭乱以后，朝鲜开始全盘流行慕华思想和“崇明”意识。当时的朝鲜士大夫们将他们的崇明意识等同视为《春秋》中诸侯国尊周的大义观念，如此根深蒂固[15]。

事实上，朝鲜士大夫们对“箕子朝鲜”的强调，除了朝鲜具有和中华文明的同源性、同等的文明程度以外，还表现了对箕子思想和箕子精神的宣扬。例如，尹斗寿（1533–1601）作有《箕子志》，之后栗谷李珥对这本《箕子志》进行了补充和整理，作有《箕子

实记》（一卷，1580）。他不仅把箕子的形象描写为一位追求教化的君主形象，而且将其拥戴为跟孔孟程朱比肩的东方圣贤，从学术角度深化了箕子思想。由此，李珥以后对“洪范”的研究热潮盛行起来[16]。

因为鲁认也师从于李珥学派，李珥的学问以及历史认识自然对鲁认產生了影响。因“崇明意识”和“箕子思想”的宣扬而具有了小中华思想；从华夷世界观方面来看，强调了朝鲜并不属于野蛮的“夷”，而是属于开化的“华”。

从十六世纪朝鲜士大夫们的观点来看的话，不管是慕华思想，还是主张箕子东来说，其中的核心是“中华”。所谓的非“东夷”的主张。他们为了强调比中国更中国，以此思想基础选择了性理学（朱子学），高度推崇朱子的著书。这一答案也在宋时烈（1607–1689）的主张中有所体现。

我东虽曰东夷，高丽之时，《朱子语类》称之曰：“高丽风俗好。”高丽之世，夷俗未变。……粤自丽末，圃隐郑先生出而当路，蔚然出幽迁乔。一以礼义变其旧俗，而又得朱子书于中州，以教于国中，自后道学渐明。……窃闻中州人皆宗陆学，而我东独宗朱子之学，可谓《周礼》在鲁矣[17]。

宋时烈主张，正如《周礼》在鲁国一般，朱子学也存在于朝鲜。即，认为当时学术和思想的正统性在朝鲜。

箕子朝鲜、小中华的主张也如实地反应在了《锦溪日记》中。4月11日早食以后，鲁认等头一次进福州军门拜谒了大司马。当时呼坐营等向鲁认询问了朝鲜的礼仪和风俗方面地制度。当时的状况记录如下：

呼坐营以□使招我。我买二人轿进去其衙。则将军下堂迎来，以礼相接三茶后，即命酒酬酢。傍有衙客三人书示曰：“愿闻贵国风教婚丧之礼也。”答曰：“我国凡风教，一依箕圣八政之教。而冠婚丧制，则只遵朱晦庵家礼。”左右叹之，更加敬待。又衙客等，皆欲以其像相之。我略以所见答之曰：“凡相人，只辨富贵、贫贱、夭寿而已。不知其神妙如合符节耳。”彼客曰：“此言可谓神矣！”[18]

这里可以得知几个事项。第一、可以得知，当时以呼坐营为首的中国士大夫们非常关心朝鲜的风俗和冠婚丧祭。同时，朱子的故乡福建省也对《朱子家礼》持有非常敬仰的态度。第二、依据鲁认所说，朝鲜的风俗和教化是根据箕子的八政之教，朝鲜的冠婚丧祭都是出自《朱子家礼》。第三、可以知道，当时不管是朝鲜或明朝，士大夫们都喜欢看相。在此，朝鲜文明的根据是从箕子出发的，并重视《朱子家礼》的鲁认这些认识，与崔溥历史认识是几乎同样的。

鲁认在当时福建省布政司徐即登的安排下于5月12日到7月16日近两个多月的时间生活在两贤祠书院。当时他就有了跟福建省秀才们一起讨论各种问题的机会。例如，除了对两国的科举制度、学术思想、社会制度进行比较以外，明朝的秀才们也对朝鲜的风土人情表现出了相当大程度的关心。5月13日在讲堂进行参拜后，各位秀才请教了朝鲜的风俗教化。

鄙亦参谒，则诸秀才因坐堂中，书示曰：“愿闻贵国风教及婚丧祭等礼。”我示之曰：“风教只依箕圣八政之教，而婚丧一遵晦庵家礼。”有一秀才，微笑入房中，持来《大明一统志》，搜展四夷风土记中朝鲜记，使我视之。记曰：“朝鲜

人，父母死则壑葬、水葬、瓦葬，而崇佛喜巫。户外脱履，常坐地上。白昼市井，男女携手并行，善诱使酒。”[19]

有趣的是，明朝的秀才根据《大明一统志》指出了朝鲜的壑葬、水葬、瓦葬盛行，指责了葬礼的落后性。而且还信佛教喜好巫术，批判朝鲜追随异端。说有着脱鞋坐在地上、大白天的男女手牵手、互相劝酒的野蛮性风俗，批判了朝鲜风俗的野蛮，全面否认了鲁认所强调的《朱子家礼》在朝鲜的流行。通过《大明一统志》可以掌握明朝中国知识分子们对朝鲜的认识。对此，鲁认的反驳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览毕，答示曰：“此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此一统志，则太古之古史，泛修外国之□也。我国虽曰番邦，檀君与尧并立，而与中国肩比内附。故武王特封箕圣，衣冠、文物、礼乐、法度，一遵华制，而吾道东者久矣。秦属辽东、汉封郡县，自晋时各分疆域，自为声教。然恭修职分，事大以诚，与诸夏无异……三纲五伦礼仪廉耻，可轶于三代之上，故得称小中华之名素矣[20]。

所谓“太古之古史”说的是包括高丽时代历史在内的朝鲜时代以前的历史，反驳了《大明一统志》的历史并非朝鲜王朝的历史。鲁认在这里强调了对朝鲜的重要历史认识。首先，“我国虽曰番邦，檀君与尧并立，而与中国肩比内附。”这强调了朝鲜也跟中国一样有着相似的悠久历史。其次，“故武王特封箕圣，衣冠、文物、礼乐、法度，一遵华制”是根据“箕子东来说”强调了朝鲜和中国文明的同源性。再次，承认韩半岛汉四郡的设置，最后以从魏晋南北朝时代开始各自施行声教来强调具有跟中国相同水准的文明。

总之，“檀君与尧并立”，强调了朝鲜历史的悠久性跟中国相似的。另外，朝鲜文物和礼乐制度，“一遵华制”，因此“与诸夏无异”。在“事大以诚”中，事大的目的不在“慕华思想”和“钦华思想”，而在于追求与中国文明的同等。朝鲜的“三纲五伦礼仪廉耻”，超越了三代以下，因此小中华的名称，来自于与中国文明的同等性和同源性，故朝鲜与中国比肩。表现了对朝鲜大地的文明和历史自豪之情。因此，鲁认通过反驳说明，展示了有关朝鲜文明和历史的具体性事例。

第一，强调朝鲜重视教育的风潮及实行了有关孝诚、心性的教育。“大概我国文献，则文武科外，又别举孝廉科。故家序党塾国学，弦诵洋洋，达于四境。凡子生八岁，先教《孝经》，《心经》然后，次学《四书六经》，皆以明经科为业。”[21]具体说明了朝鲜家庭重视教育的风土及教育孝顺和心性后才教四书六经的教育过程。其次，在这样彻底的贯彻孝的教育环境下，“况三年之丧，无贵贱，一也。虽奴贱之人，父母之丧，非独不用酒肉，至于居庐哭泣，啜粥三年，柴毁自尽者亦有之。”[22]无论身份之贵贱，父母之丧，都守三年之丧。朝鲜能够获得“小中华”之称的关键正是因为对孝的教育、科举制度、三纲五伦、礼义廉耻、重视教育等方面跟中国无二。这既是十六世纪朝鲜具有“小中华”意识的理由，也是自称“小中华”的重要核心。可以得知这跟跟单纯的钦华思想不同，而是强调了对自己的文明、历史和风俗的自豪之情。

鲁认的这些观点在《锦溪日记》中持续反复出现。例如，5月16日，跟将停留在军营的鲁认送往两贤祠书院的徐即登（号匡岳）的面谈中就强调了同样的主张。

匡岳曰："尔之来历及流离之状，我已得领矣。箕子治化之绩，尔可能记否？"我答曰："武王臣封于朝鲜事及八政之教，载在洪范，不须烦达。但箕子都于平壤，教民五伦，丧礼最严。三年之丧，无贵贱，一也。而且以井田之法。先试于圻甸。故垄畝纵横。今尚传说矣。箕圣影子堂则在于城内。而陵墓则在城西门外五里许。守陵官二员。至今守护祭祀。倘非箕圣之德，则朝鲜岂免夷俗，而与诸夏无异哉？婚丧之礼，一遵三代遗风。箕庙血祀，虽千百世不变。"匡岳示书曰："贵国文献，果是所自来渐矣。而箕圣之德，岂特一朝鲜而已哉？"[23]

徐即登为了强调箕子对朝鲜的贡献，向鲁认询问了箕子教化的政绩。对此，鲁认说，依靠箕子的八政之教、洪范，当时朝鲜才能够免除蛮夷的风俗。强调了箕子之教是实行三年丧的根本原因，所以由于箕子以来朝鲜忠实地实行了五伦和丧礼等三代的风俗，朝鲜才能狗维持"与诸夏无异"的风俗。箕子来之前朝鲜是属于"夷"，但是由于"箕圣之德"，朝鲜能够免夷俗，虽然经过"千百世"的岁月，还是"箕庙血祀 "。也就是箕子之后的朝鲜仍然属于"华"，而不属于"夷"。徐即登所强调的是对朝鲜的"箕子恩德"。然而尽管鲁认也承认箕子的教化，但其所强调的是"婚丧之礼，一遵三代遗风"，即文化的同源性和共同性。

鲁认有机会参加了在书院召开的讲学大会。当时布政司徐即登和行人司李汝珪谈到朝鲜文明始元于箕子。徐即登介绍鲁认时称其善作诗，李汝珪如是说：

那边国风好，喜诗。秀才之子做秀才，武弁之子戴武弁，荫官之子做荫官，宰列之子做宰列，谏臣之子入□台，一自箕圣之东，文献之风有素矣。[24]

李汝珪从血缘角度说明文化的继承关系"秀才之子做秀才，武弁之子戴武弁"，但是箕子到了朝鲜之后，朝鲜文风就改变了。鲁认善于做诗的理由看来是受箕子的影响。如此来看，中国士大夫们似乎是从华夷的世界观中"夷"的观点，亦就是箕子教化的"夷"的方面来看朝鲜的。但是鲁认为了从文化的同源性和共同性的观点来强调朝鲜和中国文明的共同性而持"小中华"的主张。

总之，崔溥对朝鲜历史的沿革，强调了檀君与尧舜并立，朝鲜与中国同样有着悠久的历史。根据"箕子东来说"，朝鲜礼乐制度，来自于周武王特封箕子，以八条教民。重点说明了朝鲜与中国历史、文明具有同源性。虽然鲁认在这点上与崔溥的主张是一致的，然而不同的是，鲁认进一步强调了与中国文明的同等性，屡次反复地提出"小中华"。在此可以见到十六世纪朝鲜文人们的"小中华"意识，在这个基础上鲁认进一步强调其概念，所谓的"小中华"是"与诸夏无异"、"朝鲜与中国比肩"的，即表现了对朝鲜的文明和历史自豪之情，一再强调了朝鲜与中国文明的同等性和同源性。

（三）崔溥、鲁认对中古史的认识

崔溥《漂海录》和鲁认《锦溪日记》里面，除了这些对上古史的记录之外，都有韩国中古史，尤其对三国时代与隋唐朝的历史认识。如2月17日，崔溥到了苏州姑苏驿，当时王、宋按察御史，问了有关高句丽的历史，对此崔溥回答很有意思：

又问曰："你国有何长技，能却隋唐之兵乎？"臣曰："谋臣猛将，用兵有道，为兵卒者率皆亲上死长，故以高句丽一偏小之国，犹足以再却天下百万之兵。

今则合新罗，百济、高句丽为一国，物衆地大，财富兵强，忠智之士，车载斗量，不可胜数。”[25]

崔溥说明高句丽虽然是小国，却两次打退了隋、唐的百万之兵。其理由主要有二：其一，“谋臣猛将，用兵有道”，其二，兵卒们都亲爱上司，为了长上而死。在此，虽然重视猛将、谋略、用兵之道等文武之间统率力量，亦强调君臣之间的信义和名分的性理学之立场[26]。所以呢，现在的朝鲜是包括高句丽，百济、新罗合为一体的国家，因此朝鲜是地大物博，富国强兵，忠智之士，不可胜数的强国，表现出崔溥对朝鲜的历史与文化具有自豪之情。

3月15日在与辽东人陈玘，王钻，张景等人见面谈话中说朝鲜与高句丽关系：“且曰：‘我辽东城，地隣贵国，义同一家。今日幸得相见于客旅之中，敢将薄物，以为礼耳。’臣曰：‘贵地，即古高句丽故都。高句丽，今为我朝鲜之地，地之沿革，虽因时有异，其实同一国也。’”[27]说明了高句丽与朝鲜的继承关系，亦表现出小中华的思想。

有趣的是鲁认也与诸秀才同样谈到三国时代高句丽军队的力量。如5月20日，诸秀才与鲁认在明道堂讨论朝鲜军队的力量：

食后诸秀才聚坐明道堂。书示曰：“贵国强兵，素闻天下。隋唐之际，何其壮也。平秀之乱，何其恢之甚也。且倭奴虽能踰釜山而破王京，然有多少失着处。如闲山庆尚全罗之胜，实非平秀能之也。彼盖内掣萨摩之兵，诱之以先驱，深入他境，势其然也。今公在得还，其虚实强弱，必如指掌，不徒孟浪，幸舉一当以示也。”……秀才曰：“天下强兵，浙江当倭兵矣。”[28]

由此，清楚地了解福建士大夫对韩国古代军事力量的评价：他们不仅对当时朝鲜外交军事战略方面均有了解，而且他们高度评价过去高句丽军队的力量，同时提及壬辰倭乱时朝鲜军队的无能和虚弱。“贵国强兵，素闻天下。隋唐之际，何其壮也”的四句基本上继承崔溥的《漂海录》里面的王、宋按察御史的历史认识。另外，当时他们认为明朝的军队中，浙江军队是天下强兵。这或许与平倭名将戚继光招募浙人入伍，训练成能征善战的天下第一劲旅“戚家军”有关。

二、对宗教与思想认识

（一）崔溥的佛道观：

通过《漂海录》和《锦溪日记》里面记录的内容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十五、十六世纪末朝鲜士大夫的佛教观、佛教观的迁移过程，以及时朝鲜与明朝官员佛教观的异同。

将朱子学作为最高统治理念的朝鲜王朝，基本上建国之后不断地推动排佛、抑佛政策。这种崇儒排佛的基调愈演愈烈，到了朝鲜中期以后，程朱理学思想与理念基本上代替了所有宗教理念。而身为朝鲜初期士大夫的崔溥与当地文人交流过程当中，表现出性理学者的佛教观。

根据1月18日记录，崔溥遇见自称隐儒王乙源。“因问曰：‘你国亦有佛否？’答曰：‘我国不崇佛法，专尚儒术，家家皆以孝悌忠信为业。’乙源握臣手眷顾相别。”[29]为了“以孝悌忠信为业”，不崇尚佛法。他虽然排斥佛教，但是没有极端的看法。2月11日

在杭州与杨秀禄、顾壁谈高丽时代的佛教时，表现了类似的记录：

在杭州，是日阴。杨秀禄、顾壁，共来见臣。壁曰："我杭城西山八般岭有古刹，名高丽寺。寺前有二碑记古迹，距此十五里，即赵宋时，高丽使来贡而建也。你国人越境，尚且造寺，则其崇佛之意，可知矣。"臣曰："此则高丽人所建也，今我朝鲜，辟异端尊儒道，人皆以入孝出恭忠君信友，为职分事耳。若有髡首者，则并令充军。"壁曰："凡人不事佛，则必祀神，然则你国事鬼神否？"臣曰："国人皆建祠堂，以祭祖祢，事其当事之鬼神，不尚淫祀。"[30]

顾壁提到高丽时代义天大师捐款而重修的高丽寺，并赞扬他们的崇佛之意。但是崔溥反驳他的话，说此事为前朝高丽时代所建的，而不是朝鲜时代建立的。朝鲜把佛教看作异端，专尚儒道，人人皆以入孝出恭忠君信友。如有髡首者，则并令充军。似乎说佛教与儒道是不共戴天的。又说人们虽然祭祖，但是不尚淫祀。

根据3月8日，崔溥与陈萱、傅荣谈论太监之事，激烈批评明朝太监的霸道行为，说"刘（太监）以弹丸乱射舟人。其狂悖如此。"当时陈萱问朝鲜的道教、佛教问题："萱曰：'医道佛三法，贵国何重？"臣曰：'我国重儒术，医方次之，有佛而不好，无道法。'萱曰：'成化皇帝最重道佛二法，今新皇帝一切禁之。'"[31]

在此，可以了解除了朝鲜崇尚儒术之外，其次着重医方，虽有佛教而不喜欢，道教呢，于民间根本不存在。然而明朝随着皇帝爱好有所不同，但是基本上普遍流行佛教和道教。

对明朝的宗教，崔溥在于4月23日记录北京时较详细。根据4月23日记载北京的风俗：

北京……夷狄之君，相继建都，其民风土俗，皆袭胡风。今大明一洗旧染之污，使左衽之区，为衣冠之俗，朝廷文物之盛，有可观焉。然其闾阎之间，尚道佛不尚儒，业商贾不业农，衣服短窄，男女同制，飲食腥秽，尊卑同器，余风未殄，是可恨者。[32]

北京曾经金、元的首都，所以说"其民风土俗，皆袭胡风"，虽然"大明一洗旧染之污"，但是民间崇尚道教和佛教，不尊尚儒。在经济方面，不重视农业而注重商贾。充分体现出传统"士农工商"的观念。应该男女有别，并尊卑需要有别， 但对服饰上"男女同制"、在饮食上"尊卑同器"的北京习俗，他认为此属于胡风夷俗。他对这些重视实用的北京习俗极为不满，就是暴露出重视正名、名分和形式的性理学者的观点。所以表现出"余风未殄，是可恨者"的遗憾。

5月24日崔溥见面本属于朝鲜出身的戒勉僧，通过他们的谈话，不仅了解当时明朝的宗教情况，而且也了解到崔溥佛教观。

臣曰："汝以清净之流，宜在深山之中，何为僧冠俗行，出入于闾阎之中乎？"勉曰："僧入山中久矣，今为官吏所招来。"臣曰："招以何事？"勉曰："大行皇帝尊崇佛法，巨刹半于天下，方袍多于编户，僧等安卧饱食，以修释行。新皇帝自为东宫，素恶僧徒，及即位，大有翦去之志……"臣曰："此乃撤寺刹为民舍，毁铜佛为器皿，发髡首充军伍之渐，乃知大圣人之所为，出于寻

常万万也。汝徒尝祝厘曰， 皇帝陛下万万岁，汝之祝厘如是， 大行皇帝之崇佛如是，寺刹僧佛之盛又如是，大行皇帝寿未中身，八音遽遏。汝之祝厘之勤，安在哉？”[33]

大行皇帝(宪宗)庇护佛法，佛法极为流行，和尚数量增加很多。可见，明朝佛道靠皇帝等统治阶级的爱好和扶持，或极盛或衰落。但是孝宗即位后推动废佛政策。对此，崔溥说这是继承“大圣人之所为”之事。批评僧人平时祝愿大行皇帝的万万岁，但是崇佛的宪宗皇帝，却“寿未中身”了。这些观点为典型的朝鲜性理学者的佛教观。

这些观点经常看到朝鲜儒者的身上。几乎与崔溥之同时期，如中宗三年（1508）大学生蔡忱等上疏曰：

殿下既已命罢修创之擧，而独未蒙革罢(忌晨)之命，臣等无任缺望之至……臣等不忍见祖宗之灵，屈辱于夷狄之鬼，释氏之祸，因此而益炽矣。伏愿殿下，既已命罢重创之役矣，继之以革(忌晨)之斋，罢两宗及诸寺住持等，发一国四方之群髡，悉归诸平民，使佛氏之教，复不得毁乱我圣人之道，则不惟吾道之幸，实宗庙社稷之福也。[34]

他们认为释氏之祸越来越多，祖宗之灵屈辱于夷狄之鬼。所以他们主张罢两宗及诸寺住持，将他们统统还俗、归于平民。因为佛教是毁乱我圣人之道的异端，一定要废除佛教；这不仅是吾道之幸运，而且宗庙社稷之福。为了保全宗庙社稷，佛教非废除不可。中宗十三年（1518）司宪府大司宪李沆、司谏院司谏金希寿等合司上疏也曰：

夫道教,异端之一耳。荒怪妄诞，欺世亵天，贼吾道之甚者…日者上院烧幡之会,邪僧、妖尼,矫托内旨,诳惑愚民。此虽不出于殿下之宫中,而民或不能无疑于万一者。诚以左道之根柢,尚在于都中,而邪正之分不能明示于万民也。而况香火之供不絶于名刹,祈祷之祀或施诸方外。虽欲去衆疑而无群惑,其可得乎?.....方今天灾地异、物怪人变,加以西北有警,天之所以警动殿下者,不一而足。殿下何不荡涤异教、扶植正道以应天心乎？[35]

从这些道教、异端之一、荒怪妄诞、欺世亵天、邪僧、妖尼、诳惑愚民、荡涤异教、扶植正道等词汇和观念可以了解到，当时朝鲜士大夫对其他宗教和思想的观点就是佛、道是不共戴天的。这些片面的排他性，至十六世纪的末，在鲁认身上表现得更加明显。

（二）鲁认的佛道观

在此，通过《锦溪日记》里面的记录来了解一番十六世纪末福建的思想与宗教观念。另外，也可以了解当时明朝士大夫的佛教观，同时还可以了解朝鲜士大夫与明朝官员宗教观的异同。在朝鲜士大夫的眼里，佛教是与儒教不共戴天的异端。鲁认亲眼目睹了明朝儒、佛融会情况后，感到很惊讶。根据《锦溪日记》记录：

晴。有一老僧，自外入来司中。杨坐营即出揖罢，分椅东西，待之极尊。言必称和尚，而请茶三椀。我怪而问之，乃乌石山正觉庵老僧。又问曰：“休粮道师耶”。衙客曰：“岂能休粮，但巧铸佛像者也”。盖中国待僧之俗如是矣。[36]

杨坐营等衙门官吏一见到老僧就出来作揖，并分椅东西，给他赐坐，待之极尊。鲁认

看到明朝官员有如此尊崇对待佛教僧侣的习俗，觉得非常不满。因此第二天找杨坐营问理由。如：

雨。杨坐营出坐中堂，与衙客话。我持笔砚进拜而书示曰："昨日老僧，如何道僧耶？"坐营亦以笔示之曰："虽非道僧，乃吾素善，儞何以问耶？"我示曰："虽素相善，若非道僧，不过惑诬之辈。堂堂大丈夫，必困辱而奴之者也。何必待之以礼乎？"坐营曰："贵国亦无此辈乎？"答曰："盖此辈，足下之所同有。"[37]

在此，很明显朝鲜与明朝宗教思想不同之处。"明朝在宗教思想方面基本上持有三教融合、兼容并包的态度，而朝鲜王朝在崇儒排佛的国策上，仅承认朱子学，其他佛、道一律禁止，甚至连阳明学也属于排斥的对象。"[38]在这里还可以看出身为朝鲜中期士大夫鲁认对佛教的极端观点：他不仅把一般僧人看成"惑诬之辈"，而且还将僧侣看作是"困辱而奴之"的奴婢，认为对这些和尚不应该以礼待之。

紧接着他举朝鲜的例子来具体帮助之后，得出结论是"吾道堂堂，异端寥寥矣"（5月4日），除了性理学（朱子学）之外，其它的都被看成了"异端"。又在《锦溪日记》里详细记载有关普雨杖死的情况：

中古有一道僧，挺出京山。其名宝祐，能文章通佛经，畿民多惑焉。儒林抗章九重，明其罪状，充军于济州絶岛。知府日日酷杖，旬日之内卽死。故自此异端之徒，摧挫自戢。而亿万苍生，只游于名教五伦中矣。夫何中国，以圣人之渊薮，礼义之根本，异端之盛至此。而寺塔峥嵘于城市，而緇衣横行于各衙耶。坐营曰，自梁武而后，弊痼已久。宋贤诸儒及我朝硕儒，虽极严治排斥，但风俗忠厚，只以虚文应接而已。岂可尊信那辈耶？且那辈虽有，何伤吾道哉。贵国之风若然，儒释悬殊严明。文献之称，果有所自来矣。[39]

鲁认所谓的"宝祐"，应该是"虚应堂懒庵普雨大师（1509–1565）"，朝鲜中期明宗时期佛教界的关键人物，同时也是朝鲜中后期佛教发展方面极为重要的核心人物。明宗年幼时是由文定王后来垂帘听政的。在文定王后的支持下，普雨积极推动恢复了已经失去的禅、教两个宗派，同时主张禅教一致与儒佛调和。

时隔四十三年后，至明宗五年（1550），经过懒庵普雨的努力，在文定王后的大力支持之下，中宗二年（1507）正式被废除的禅教两宗制度重新得到恢复，僧科制度、度牒制也得到了恢复[40]。因此，短短两年期间选拔出了4,000僧侣，还实施了度牒制等，同时指定300家寺院为国家公认的寺庙加以保护[41]。由于十六年的佛教恢复政策，朝鲜佛教呈现出一时复兴的迹象。

然而朝鲜的儒生们一向激烈反对佛教恢复政策，主张打死妖僧普雨。至明宗二十年（1565），随着文定王后去世，普雨的这些恢复措施重新遇到挫折。最后，他被贬到济州岛，终于在那里被杖刑致死。他殉教入寂后，隔年明宗二十一年（1566）4月20日，普雨恢复的措施全面遭到废止[42]，好不容易复苏气象的朝鲜佛教又变为无宗团的山林佛教。

鲁认举普雨禅师的例子，激烈批判佛教，并谴责杨坐营与和尚自由来往，说："以圣人之渊薮，礼义之根本，异端之盛至此"。与鲁认之激烈排佛相比，杨坐营的佛教观完全

不同。他说宋贤诸儒、硕儒，虽然极力严治排斥佛教，然而由于风俗忠厚，以虚文应接和尚们，也完全无妨无碍。他又说即使明朝有了佛门方外，亦没有伤害到吾道（儒家）。可见，杨坐营体现出福建士大夫的兼容并包、儒释统摄的多元化思维。

由此可以了解到十六世纪中叶朝鲜朝排佛政策的森严程度、儒生们对其他宗教思想的强烈排他性。

将儒学（性理学）作为最高统治理念的朝鲜王朝，建国之后一直推动排佛、抑佛政策。这种崇儒排佛的基调愈演愈烈，到了朝鲜中期以后，程朱理学思想与理念基本上代替了所有宗教理念。而当时的中国则是完全不同的景象。

三、结语

崔溥与鲁认，皆为全罗道罗州人。他们都代表朝鲜性理学者的门下：崔溥师事于金宗直，成宗八年，24岁中进士。鲁认师事于李珥门下（南塘金光运），宣祖十五年，17岁中进士。他们在漂流过程中都为亲丧中（鲁认认为他的父母都去世）。他们各留下了日记体记录《漂海录》与《锦溪日记》，都记录了中国南方的历史文化。

崔溥一再强调“一遵华制”、“一从《朱文公家礼》”在此基础上，崔溥定为“我国与大国为一家”，因为“大明初出海上，万邦所照”。虽然在《漂海录》里面没有提到“小中华”三个字，他不仅反映出慕华思想，亦完全表现出小中华的意识。过了约一百年之后，在鲁认《锦溪日记》里面，经常出现“小中华”三个字。可以了解十六世纪朝鲜普遍存在“小中华”意识。鲁认《锦溪日记》把朝鲜的风教礼仪概括为箕子的八政与《朱子家礼》，强调与中国风教无异，而且非常详细地帮助朝鲜与明朝的同等性、同源性。鲁认所强调的“小中华意识”，核心在“朝鲜与诸夏无异”，强调了朝鲜与明朝文明的同等性。

通过崔溥《漂海录》，十五世纪明朝包括北京城，民间道教和佛教颇为流行，不完全尊尚儒术。在经济方面，脱离士农工商的观念，注重商贾。崔溥对这些重视实用的首都北京城习俗和佛道流行极为不满，就是体现出重视正名、名分和形式的性理学者的观点。崔溥还主要为了“以孝悌忠信为业”、“人皆以入孝出恭忠君信友”的观点排斥佛教。可说，除了性理学（朱子学）之外，其它的都被看成了“异端”，这是崔溥和鲁认的共同点。

然而鲁认对佛教观点比较极端。鲁认把僧人看作“惑诬之辈”，所以应该“必困辱而奴之”，不宜“待之以礼”，非常骄傲地说在朝鲜“吾道堂堂，异端（佛教）寥寥矣”。尤其是他去考察福州寺庙或与当地官员交流时， 提出了他对佛教的极端看法并介绍了朝鲜佛教在崇儒抑佛的国策之下被压抑的情况。此事与明宗时，文定王后扶持佛教政策有关。由此可了解到十六世纪末朝鲜佛教的严峻情况，同时还能了解到明朝福建“三教融合”的情况。 即十六世纪末闽地官员杨坐营认为，宋明诸儒虽极力严治排斥佛教，但由于当地“风俗忠厚”，所以“虚文应接僧人”也无妨。这里可以知道明朝官员非常尊重与重视当地风俗习惯。这些儒佛融合的观念与朝鲜士大夫独尊儒教（朱子）有明显的不同。

注释：

[1] 韩国东国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北京语言大学客座教授。

[2]《史记》卷三十八。

[3] 崔溥《漂海录》第一卷，2月4日

[4] 高句丽已经有箕子信仰的存在：《旧唐书》卷220，《东夷列传·高丽》：“俗多阴祠，祀灵星及日、箕子、可汗灯神。”

[5] 崔溥《漂海录》第二卷，2月17日。

[6] 世宗十年（1428）箕子祠堂重修，荒废的祭典恢复以来，在朝鲜箕子被奉为以井田制和八条教来教化朝鲜的教化之主，同时也被认识施政王道政治的仁君。《韩国儒学通史》中，页214。

[7] 详细的说明在后。崔溥的这些历史认识在《东国通鉴》里面可以看到。

[8] 崔英成：《韩国儒学通史》中，（首尔）simsan出版社，2006年，页217。

[9] 崔溥《漂海录》第一卷，2月4日。

[10] “又曰：‘你国礼有几条，刑有几条？’臣曰：‘有吉、凶、军、宾、嘉。刑有斩、绞、流、徒、杖、笞。一从《大明律》制。’”，崔溥《漂海录》第二卷，2月18日。

[11] 崔溥《漂海录》第一卷，闰正月19日。

[12] 崔溥《漂海录》第一卷，闰正月21日。

[13] 崔溥《漂海录》第二卷，二月7日。

[14] 崔溥《漂海录》第二卷，二月8日。

[15] 崔英成：《韩国儒学通史》中，（首尔）simsan出版社，2006年，页211。

[16] 崔英成：《韩国儒学通史》中，（首尔）simsan出版社，2006年，页211–216。

[17]《宋子大全》卷一百三十一，25a,《看书杂录》。

[18] 鲁认《锦溪日记》4月11日。

[19] 鲁认《锦溪日记》5月13日。

[20] 鲁认《锦溪日记》5月13日。

[21] 鲁认《锦溪日记》5月13日。

[22] 鲁认《锦溪日记》5月13日。

[23] 鲁认《锦溪日记》5月16日。

[24] 鲁认《锦溪日记》5月25日。

[25] 崔溥《漂海录》第二卷，2月17日

[26] 임상선,《표해록을 통해본 최부의 고대사인식》，《韓国史學史學報》28（2013,12）頁88。

[27] 崔溥《漂海录》第二卷，3月15日。

[28] 鲁认《锦溪日记》5月20日。

[29] 崔溥《漂海录》第一卷，闰正月18日。

[30] 崔溥《漂海录》第一卷，2月11日。

[31] 崔溥《漂海录》第二卷，3月8日。

[32] 崔溥《漂海录》第三卷，4月23日。
[33] 崔溥《漂海录》第三卷，5月24日。
[34]《中宗实录》卷六，中宗三年，5月8日。
[35]《中宗实录》卷三十四，中宗十三年7月27日。
[36] 鲁认《锦溪日记》，5月3日。
[37] 鲁认《锦溪日记》，5月4日。
[38] 朴永焕：《儒释冲突与调和–近现代台湾与韩国汉传佛教比较》，《求法与弘法》，释果镜主编，法鼓文化，2015，页528。
[39] 鲁认《锦溪日记》，5月4日。
[40]《朝鲜王朝实录·明宗实录》明宗九年11月13日。
[41] 具凤龄：《栢潭集·拟弘文馆陈弊疏》卷六，《韩国古典综合DB》。
[42] 虽然普雨复兴的措施较短暂，只有十六年而已，但其对后来朝鲜佛教发展上影响甚大。譬如壬辰倭乱后，朝鲜朝佛教的重兴人物清虚堂休静、四溟堂惟政，他们都是普雨主管的僧科出身。金龙泰说："普雨不仅重新调整和确立禅教两宗和僧科制度等，还培养出朝鲜佛教界新的人才。燕山君以来几乎灭绝的朝鲜佛教人脉由此重新得到复苏。此时国家正式认可出家的僧才，壬辰倭乱时积极参加从军。由于他们的功劳，朝鲜末期佛教命脉才得以延续下去。"（《임진왜란 의승군의 활동과 그 불교사적 의미》），《보조사상》，37집(2012.2)，231쪽。

（作者单位：韩国东国大学）